



# 全球语境下的体育强国理念

黄聚云

**摘 要:** 将全球语境与中国话语的比较作为最基本的逻辑线索,从世界体系、现代化、全球资本、社会问题和个体化等5个角度对“体育强国”进行侧面剖析。认为对“体育强国”事业的认知必须建立在对全球背景和中国现实的整体把握这一基础上,从而全局性地审视“体育强国”理念和发展道路。

**关键词:** 体育; 全球; 社会; 理念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207(2009)04-0011-04

## Concept of Sports Power in the Global Speech Circumstances

HUANG Ju-yun

(Shanghai Institute of P.E.,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basic logical clue of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global speech circumstances and the speech right of China, the article analyzes Sports Power from the angles of world system, modernization, global capital, social problems and individualization. The recognition of Sports Power should be based on the global background and the reality in China. So the concept of Sports Power and the way of development should be viewed all-sidedly.

**Key words:** sports; globe; society; concept

建成体育强国已经成为我国体育事业的既定战略目标。体育行政部门在“体育强国”战略上的立场明确无法消除学术界对其基本内涵的模糊不清。可以肯定地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体育强国”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逐渐明确的概念,企图一劳永逸地给出终极答案的想法是草率的。一种整体性的眼光有助于对“体育强国”的理性把握,通过将其置于全球语境之下,可以使我们跳出体育领域、超越国界、穿越时空,来全局性地审视“体育强国”理念和发展道路。

## 1 世界体系波动中的民族国家振兴

中国的“体育强国”事业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自有国家以来,强国的兴衰更替就成为人类历史进行曲当中最强劲的奏鸣。自进入全球互动时代后,整个世界成为一个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分层体系,最强大的国家居于该体系的核心,而较弱小的国家流于边缘,还有很多国家处于半边缘、半核心位置。由于激烈的竞争,国家分层体系时常处于变动当中,总有一些国家会滑向边缘,一些国家挤向核心,而核心国家也会不断面临来自非核心国家的挑战。在过去数百年,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和美国等都曾经有机会并参与了核心位置的争夺。在当今世界国家分层体系中占据核心的是美国;原本处于边缘而今处于半边缘、半核心的中国正以强劲的势头迈向核心。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无法取代美国的核心地位,中国的核心化趋势也并非不可逆转,但中国无容质疑地以一种举世瞩目的冲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高歌猛进。

中国的体育事业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探求历程中扮

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近代中国受尽列强欺凌、面临亡国灭种之危险,这与国民体质的孱弱不无关系,有识之士乃提出“强国先强种”、“体育救国”等主张;以天朝大国、文明古国自居的民族优越感被无情又无奈的现实冲洗荡尽之后,聊以自慰式地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难以与列强抗衡的领域之外寻找尊严与地位,体育(确切地说,是竞技体育)自然而然成为优先选项,与民族主义情感以一种令外国人不易理解的方式糅合起来,为新中国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调。新中国成立之后,体育关乎国家荣誉、国民士气、国家利益的色彩不但没有弱化,反而随着中国体育事业接连不断的重大成就而日益强化起来。时至今日,在中国的各项社会事业都力求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大趋势之下,体育事业尤其是竞技体育事业是较有可能率先成为“世界霸主”的,这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得到了有力地验证。中国体育界自然而然地充溢着一种强烈的“以体育来强国”的使命感和亟待在世界体育高峰登顶的心理气氛。

认识这一点是理性把握“体育强国”的基本前提。正是这一时代背景赋予“体育强国”强烈的政治色彩,使其堂而皇之地披挂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纱衣,成为一种不容辩驳的国家话语。

“体育强国”提法预设了基于体育实力的国家强弱分层特性,即体育是国家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通常将其列入软实力范围——国家之间的体育实力可以进行比较,从而区分体育的强国或弱国,并因为体育实力的差异影响国家的综合实力。而在这一预设的背后,是一组虽然模糊却根深蒂固的观念——体质有强弱、运动有高下等等——与竞技体育

收稿日期: 2009-06-11

基金项目: 2009年上海体育社会科学、决策咨询项目(TYSKYJ2009080)

作者简介: 黄聚云(1975-),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和农村社区研究。

作者单位: 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人文学院,上海 200438



大有渊源，而竞技体育又与国家荣誉、民族尊严存在天然亲和力。所以，如果不加反思的话，很容易导向对竞技体育的偏爱，出现体育竞技化的偏差，使“体育强国”局限于“竞技体育强国”。

不可否认，体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家实力的某些特征，但还有很多超越了政治、国家范畴的属性，例如体育的精神、道德、伦理、乐趣与美感等，它们无法像运动技术和成绩那样清楚地以高低强弱衡量，但却是体育更为核心的组成部分。而且，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序列竞争的世界，一个国家不会只因为资源丰富、规模巨大、拥有摧毁性的力量而自动居于核心位置，它还必须具有创新能力和文化张力；同样道理，一个国家的体育事业也不会因为资源充足、金牌领先等所谓“实力”衡量指标上的优势而成为“体育强国”，它还必须具备主导世界体育发展潮流，满足国家、国民的各种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体育强国”事业也必须区分内涵建设与外延建设，增加资金投入、扩大场馆面积、提高体育人口比例、增强国民体质、提升运动技术水平、发展体育产业，这些都只是外延建设而已，真正的内涵建设要考虑的是体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国民的思维、行动、生活、人生乃至生命之中。

## 2 后现代氛围中的现代性建构

“体育强国”事业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现代化是最近数百年世界历史最为重要的主题。不同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模式和程度上的差异使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面貌。当西方发达国家日益步入一个所谓“后现代”的状态之时，有些国家仍然处在经典现代化的未完成阶段。“后现代”并不是一个与“现代”不同的时间概念，而是指某种“超越”或者迥异于经典意义上的“现代”的社会状态。

支撑“现代”社会的基础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科层制、福特式流水线、市民社会和建立在宪政制度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等。而支撑“后现代”社会的基础是全球资本、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科技、大众传媒、新兴服务业、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后福特制、虚拟社会和非主流群体的解放运动等。中国正处于一个“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并存交互、难解难分的状态，这给各种社会事业的开展提供了多向度开放的思路与可能性的同时，也带来很多复杂而微妙的问题。

从发展道路上来看：（1）中国的体育事业一直是在追求“上升”、“前进”的，各级体育领导总是希望自己任期内的政绩是超越上届的，这种政绩的追求还常常以目标责任乃至量化指标衡量的形式实施，属于经典现代理念；而在后现代理念看来，以上不过是种简单的直线思维，发展并不必然表现为政绩的逐年攀升，更不等同于金牌总数的递增。（2）中国体育事业一直在探索某种先进的“发展模式”，并形成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推崇西方，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另一种推崇中国，主张形成“中国模式”，其典型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而从后现代理念看，“先进”与“落后”是很难区分的，任何一种模式都有难以克服的弊端；后现代社会强烈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对一切固定模式提出了挑战。（3）中国体育事业是在一个统一的决策机构

领导之下有目标、有计划地开展的，预设了体育行政机构具有理性决策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从后现代理念看，人类的理性认知与行动时常伴随各种非理性的后果，决策必须考虑风险。“体育强国”事业并非是一种自动导向绝对完美愿景的稳健活动，曲折不可避免，危机随时可能发生。而我国体育事业中拍脑袋决策、朝令夕改的情况比比皆是，不仅在变数较大、未知因素较多的领域如足球管理体制变革存在，在一些貌似“稳妥”的领域如体育教学管理中也不鲜见。将危机应对视为常态，或许应该成为体育决策机构的基本心态。

从发展程度上看：（1）中国体育事业存在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在地区、三大体育领域和体育项目之间存在，在不同的人群中恐怕更加严重。当一些贫穷落后地区居民连起码的体育权利都难以保障的时候，东部沿海大都市的一些富裕居民已经在享受奢华的休闲运动了——这背后隐藏了“现代”与“后现代”两种不同的诉求，前者需要生存并融入“主流生活”；后者需要娱乐并摆脱“主流生活”。两种诉求在“体育强国”发展的大局中有可能相互竞争，影响体育政策、制度的制定和体育资源的分配。（2）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面临很多瓶颈问题，如人口问题：中国人口结构不够合理，受过高层次教育的比例少，文盲数量多，过于集中在东部地区，城乡、男女比例失调，残疾人口总量巨大，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遗传病、地方病多，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较差。这些问题主要是经典现代化未完成或者进展不利遗留下来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后现代因素的推动。（3）中国体育事业出现过不少值得深思的偏差和失误，例如：学校体育工作领域出现的体育课“娱乐化”现象，这固然有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但对学校体育专家所谓的“科学规划”的盲目崇拜则是更为直接的原因。体育课“娱乐化”颇有几分“后现代”色彩，而科技专家崇拜则是“现代”的重要表征，二者的“合谋”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无独有偶，我国的体育学术科研也被“现代”和“后现代”的双重“阴谋”合伙“算计”了：量化的科研考核与大批量的科研成果生产——这属于典型的“现代”行为；把科研成果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以换取经济、权力资源，将科研过程变成一种自得其乐式的文本游戏——这可算作“后现代”生存了。这种“合谋”不再仅限于个别领域，而是向全局和深层拓展。在理应追求真理的体育科研和旨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体育教育领域都“中招”的现实面前，不由得我们不担心：“体育强国”的宏图大业会不会也走上这一步呢？

## 3 全球资本冲击下的国家意志强势

资本是近现代各种重大社会变革背后的一个基本动力。20世纪之前，资本通过殖民侵略和资源掠夺完成其原始积累并向全球扩张，所走的是一条刺刀开辟的道路。进入20世纪之后，资本舍弃了赤裸裸的武力，开始拉拢国家权力为其打手，扶持跨国公司为其代理，并用高新科技为其武器，突破时空限制，铲除贸易壁垒，开辟出一块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并将世界所有经济体纳入其统治范围。而当代的资本完全隐去了其早期的暴力脸孔，以各种能够最大限度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引起愉悦感、通常配以华丽的物理



包装或标加了炫目动听的文化符号的商品为糖衣炮弹,攻陷了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渗透到社会所有角落,并或隐或显地控制着每一个人的生活。

资本犹如一个拥有自己生命和意志的魔怪,它强大无比又神秘莫测,开创一切又摧毁一切。而在传统社会至高无上的国家意志同资本相比,倒像一个年迈过时的骑士,身躯庞大、反应迟滞,被过往的历史、抽象的荣誉和烦琐的家理事牢牢束缚了手脚,宁可留守在自己的城堡与领地,也不愿意去未知世界探索冒险、开疆拓土。

在资本世界里高居顶端的是以世界五百强为代表的全球资本,它们完全拥有足以摧毁弱小国家或轻而易举地迫使这些国家臣服的力量;对于强大的国家,全球资本也会以多种手段诱使或迫使它们服从自己的游戏规则。中国无疑是以强大的国家意志而见长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像中国那样令数亿国民按照统一的意志行事。这种空前强势的国家意志使中国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源办大事,在困难的情况下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60年国家建设的成功经验不断地验证和强化着这一特色,并累积成一种不可遏止的历史惯性,裹挟着中国的各种社会事业。在全球资本横扫天下的今天,这种强势的国家意志几乎成了唯一可与争锋的力量。而中国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中国国家意志与全球资本的博弈过程。

“体育强国”事业如同在全球资本的汪洋大海中行进的航船,而国家意志就是这航船的舵手,只有熟悉全球资本的特性,才能扬起“体育强国”事业的风帆,使其向着理想的港湾安全进发,而不至于中途触礁、沉没。如果国家意志自命清高,无视全球资本的诉求和影响,必然导致“体育强国”事业物质资源的匮乏和配置的不当,从而丧失航向长远目标的给养和动力。反之,如果国家意志自贬身价,对全球资本低眉顺眼,虽然可以获得可观的资金投入作为酬赏,但很容易导致体育事业自主性、公益性、民族性和人文性的丧失。

全球资本的冲击对操控“体育强国”事业的国家意志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如何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问题,几乎所有具体领域都遭受到了全球资本的侵袭、渗透;不仅体育产业等的发展要完全纳入全球资本制造的洪流,体育教育又何尝不是在为全球资本培育人力资源呢?就连奉为神圣的国家荣誉也不得不时常屈辱为全球资本贴金。在势不可挡的全球资本面前,国家意志统治的领域在纷纷失陷。中国的国家意志虽然无与伦比的强大,但同时也隐藏着不少弊端,它拖着规模庞大、机构臃肿、内耗突出、负荷过重的身躯,殊乏在多变时代必需的轻盈机动特性;并且有可能在全球资本的腐蚀之下分化、削弱、动摇,丧失广泛的代表性、崇高的信念和强大的动员力。如果国家意志未能发展出一种保证自己的特色、优势并最终胜出的智慧的话,则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体育事业将沦为一种打着国家意志的旗号由众多国民集体无意识地参与以获取肤浅的娱乐体验的身体游戏;一批批由全球资本扶持起来的、消费价值远胜过道德价值、追求金钱利益强于国家荣誉的运动明星将成为“体育强国”的唯一一种“合法化”的“形象代言人”。这恐怕是目前的主流价值观所不愿看到的。

#### 4 多重危机威胁下的社会和谐诉求

当今时代是个既生机勃勃又危机四伏的时代。人类在获得更强大的力量的同时也在不断遭受更严重的威胁。自然界的“天灾”早已不再被视作顶级强敌,而被人类自己有意无意制造的“人祸”取而代之。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成就最大的世纪,也是灾难最重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损害无与伦比。进入21世纪后,灾难和危机仍然层出不穷,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国际社会有恐怖主义威胁、甲型H1N1肆虐、金融危机蔓延等;在中国有“三独”活动、非典大流行、雪灾、地震等。在这些举世瞩目的危机下面还隐藏着众多更为具体、更为微观、但可能更为深刻、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风险,如:社会失范问题;健康威胁问题等。“三鹿”事件可以看作是社会失范和健康威胁双重问题。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对食品安全这样起码的保障都开始怀疑的时候,我们似乎应该抛弃关于社会发展的天真的乐观,进行沉重而理性地反思。当危机成为常态,而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伴发不可预料的后果的时候,我们应该体会到:建设“和谐社会”绝对不是中国在基本达到小康之后“锦上添花”式的“奢求”,而是维持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求。越是在危机四伏的时代,越显出和谐的重要。

“体育强国”事业是在充满危机的大环境下开展的,唯有服从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才能获得发展空间,突显自身价值(关于体育对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我国学术界早有大量论文问世,笔者不再赘述)。“体育强国”与“社会和谐”之间存在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体育强国”涉及局部,“社会和谐”统揽全局。“体育强国”需要实力作为支撑,竞争作为手段,“社会和谐”则以情感作为尺度,合作作为方法。“体育强国”推崇国家荣誉,“社会和谐”关注民生问题。“体育强国”更多表达高端意志,“社会和谐”则内含全民诉求。体育的强大需要社会的和谐作为目标和前提,社会的和谐需要体育的强大作为辅助和条件。相对于“强大”而言,“和谐”是更重要的诉求。

“和谐”需要不同社会群体能够彼此容忍、相互悦纳、共同发展。当代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产生了各种具有不同观点和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由于话语权的差异,一部分群体的观点和利益诉求得到了更好的表达,而另一部分则被忽视和屏蔽。目前,中国社会的群体分化程度如贫富差距仍在拉大。同时,作为国民观点和利益诉求集中体现的国家意志也因为受到全球资本的冲击而变得更加容易丧失公正决策、服务民众的能力。这种情况在体育中都是存在的。此外,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缓解、消除危害和谐的各种危机。对一部分危机如现代文明病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体育具有较强的功效;但是,对更多的危机体育束手无策。在此情况下,操控体育事业的国家意志很容易采取一种暂且忽略、避重就轻的适应性策略。毕竟嘛,如果做到“强大”容易,实现“和谐”困难,那何必还要为了“和谐”而耽误“强大”的脚步呢?在此思路下,有些问题如农民工体育权利保障问题、农村体育设施薄弱问题等,努力应对可营造“和谐”之氛围,却难以达成立竿见影之“政绩”,也就可以弃之不顾了。然而这是无论从伦理还是情感上都令民众(至少是笔者)难



以接受的。

作为一种公益为先的国家事业，它应该处于伟大的信念、美好的愿景和崇高的道德的主导之下，这也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如果一个国家的体育事业对各种社会问题视而不见、无所作为，甚至冷漠到只顾圈内的自娱自乐、毫无对社会的关怀意识和责任感的时候，即便其实力衡量指标再良好，也是不配被称为“体育强国”的。

## 5 个体化困境中的国民性重塑

个体化是现代化这一宏大历史变革的一个重要表现。传统社会，个体总是被牢牢束缚于家庭、宗族等群体关系之中。现代化的伟力冲跨、消解了传统社会的群体基床，使个体分子以前所未有的自由游离到一个个全新的社会空间，或者重新镶嵌到新兴的群体当中。个体赖以自我定位的群体坐标不断被改写，个体的生存状态、与社会的关系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和方式变更。这一进程就称为个体化。

个体化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所有个体的社会生活，个体化的后果具有双重特征：它使个体获得更多自由的同时又更加广泛和深刻地被羁绊；它给个体提供了日益增多甚至无穷无尽的选择可能性，反而使个体莫衷一是、无从选择；它张扬个性，却以彻头彻尾的标准化的、模块化的社会化流水线塑造出一批批无个性的个体；它使权利唾手可得，却使道德沦为空文；它使福利变成便饭，却使幸福化为泡影；它使自顾自利至高无上，却使风险危机四处潜伏；它使一切原被视为恒常、神圣的事物变得空无、流俗；它使坚守道德比破坏道德更为“可耻”，使破坏道德比坚守道德更为“人性”；它使忠诚被视作愚蠢，善良被视作懦弱；它使真诚蜕变为恬不知耻地自我暴露，使温情堕落成水性扬花地快感互换；它导致纯粹的只顾今天享乐、不管明天如何的即时感受主导式的生活模式大行其道。个体化的消极后果在西欧和北美已经尽显无遗，在中国也初露端倪。

与个体化并驾齐驱的是中国国民性的变革。传统中国国民性较突出的特征有：勤劳，勇敢，智慧；以和为贵，不重竞争，但是内耗严重；注重礼仪，喜欢矫饰，流于繁文缛节；内向，保守，缺乏开拓进取精神；过于实用等。其中，较被诟病的特征是软弱、内耗、实用等。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国国民性也在发生重要的改变：在中国日益富强的背景下，软弱性渐渐淡化；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结束了中国一盘散沙的状态，使中国人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更能够被集体动员起来、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但同时内耗现象仍然很明显；中国人长期流传、深入骨髓的以自我为圆心、推己及人、高度实用化的思维方式不仅依然根深蒂固，并以经济体制变革为助力，以对金钱、个人利益的赤裸裸追逐的合法化为表征，空前强烈地激发、膨胀起来。

个体化的流毒与国民性的顽疾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土壤中

一旦不期而遇，马上一拍即合、同流合污，使众多国人沉沦于由愈演愈烈的信念引退、理想缺失、自我中心、唯利是图、诚信丧失、去道德化和集体非理性等交织成的泥沼与迷雾当中。在可预料的将来，如果没有采取超乎寻常的强力手段的话，国人的个体生活将极有可能陷入一种远离期望的、有去无回的悲观状态。这点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

个体化与国民性是开展“体育强国”事业都必须考虑的因素。毕竟，“体育强国”最终的目的还是使国人生活得更美好，它不是一个只为体育自身发展的专门工程，而是一种为全体国民服务的社会实践，一种需要在重重危机中显现公益价值的自主应对机制。在个体化开始并终将席卷全球的无奈图景之下，个体——如果他还不愿随波逐流、听天由命的话——就应该发展出一种至少还算崇高的信念以及对社会的使命感和道德感，以确保堂堂正正、有所作为的生活；而国家需要发展出一种足以抗衡的自主应对机制，使国人尽享个体化之有利成果的同时，不至于遭受消极后果之痛苦；体育界也需要积极行动，运用体育中最美好的信念与手段来重塑国民性，提高国民的身体和精神素质，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促进中国的腾飞和美好世界的创造，从而提升体育事业的地位、品位。如果不能抵抗个体化的消极影响，就无法培育伟大的国民性；没有伟大的国民性，就没有伟大的国家，更没有“体育强国”。

## 6 结语

本文关于世界体系、现代化、全球资本、社会危机和个体化的5个角度的论述都不是对“体育强国”的直接剖析，但不能说没有内在的学理关联。对“体育强国”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对全球背景和中国现实的整体把握基础之上，全球语境与中国话语的比较构成了本文最基本的逻辑线索。作为体育研究者，且不说跳出体育看待体育的高超与理性，至少也应具备一种将对体育的“专门性”思考拉近到对世界整体大势、国家前途命运和个体社会生活的自主关怀的旨趣，这正是本文宏大而空泛的论述试图达到的。

## 参考文献

- [1] [美] 乔纳森·H·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64-169.
- [2] 高宣扬. 后现代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3] [英] 齐格蒙特·鲍曼. 个体化社会[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责任编辑：陈建萍)